

洪球編

現代詩歌論文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六月初版

全二册 定價國幣七元

編者 洪 球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淮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版權所

現代詩歌論文選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 三 作家論

#### 徐志摩論

——他的思想與藝術——

上

雖然他的大部分的作品是「五卅」以後制作的，詩人徐志摩總算是「五四」時代的詩人。他的創作活動，自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他的作品中反映的，也正是「五四」時代之一部分的知識分子的心理意識。如果說「五四」時代的代表的詩人是郭沫若，王獨清和徐志摩的話，那麼代表初期的狂飆時代的，是小市民的流浪人的浪漫主義者郭沫若，代表末期的頹廢的空氣的是落難公子王獨清，而代表中間期的，則是「新月」詩派的最大的詩人徐志摩了。

雖然沒有郭沫若那樣龐大的野心，到一切的文學的領域去作廣汎的嘗試，雖然他

的活動範圍什九止於是詩歌之內，——因為他的大部的散文，是詩的一種形式，而他的小說「輪盤」是不成爲小說，——可是徐志摩是有着他的偉大的存在的意義 (*Rais. on d'etre*)。他不止是「新月派」的盟主，而且，他的全部的詩作，是代表着「新月派」的詩歌之發展過程。在他的「靈魂的冒險」中——在他，「這靈魂的冒險是生命核心裏的意義」(迎上前去)——可以說包容着「新月派」詩歌之一切，雖然在他的多量的詩作中，含有着好些唯美主義印象主義的要素，可是詩人徐志摩不是頹廢的，而是積極的。他是現代中國的一位尼采，他深信着是一位中國的查拉圖斯脫拉。他要求着大鵬似地作逍遙的雲遊。對於他所不滿意的現代中國社會，他不抱厭世觀，而更不抱那「童孩性的樂觀主義」。雖然他的人生觀，是值得我們分析和批判的，可是他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迎上前去。)他「是一隻沒有籠頭的野馬。」他的詩歌的創作，是他對於社會不調和的表現。換言之，他的詩歌，就是他的「靈魂的冒險」的象徵。

詩人徐志摩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他始終對於他所憎惡的時代挑戰。他的

口號是 Everlasting yea, Everlasting yea。在落葉裏他那樣地吶喊，在末期的散文作品秋的裏邊，他也是那樣地吶喊。他認為「人原來是行為的動物」（落葉。）他主張用「積極的態度對運命宣戰。」因為「這是精神的勝利，這是偉大，」這是「不可搖的信心，不可動的自信力」的表現。對於社會，他所要求的是「澈底的來過。」（青年運動。）在詩篇嬰兒裏邊，他說：「我們要盼望一個偉大的事實出現，我們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現。」詩人徐志摩，信仰着他的理想，一生的努力，就是目標着他那個「馨香的嬰兒」之創造。

詩人徐志摩對於人生之這種積極的態度，是須要從他的生活環境去說明的。詩人的家庭，是相當地資本主義化的地主家庭，在猛虎集的序文中，詩人徐志摩說：「在廿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想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ilton」想使兒子進金融界之那種企圖，是證明着詩人的父親是相當地都市市民化了。想作中國的哈彌爾敦之那種野心，是足以反映出來詩人的青年時代是有着狂飈般的政治的

要求。這種向上的市民的要求，使詩人徐志摩成為「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列甯忌日——談革命），使他授受了西洋的入世的思想。在天目山中筆記裏，他說：「我們承認西洋人生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得太積極，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個熱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人放進生活的軋床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汁水回去。」他的那兩個有力量的外國字*everlasting yes*，自然是那種個人主義的表現。然而，詩人雖到了美洲的大陸，可是他從美國所受的影響，并不見得怎麼顯著。詩人自從士大夫的環境轉變到市民的環境的。從他的作品看，詩人身上，是充滿着二重的性格。我們也或者可以說，如法國的服爾德似地，他是一個貴族的市民。因之，大都市的工業社會的文明與他無有多大的緣分。惠特曼一類的詩人沒有給與過他多大的影響。而法國的孔德一流的實證主義的哲學，也像是沒有給過他若干的薰陶。他「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票過太西洋，想跟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福爾德）認真念一點書去，」（我所知道的康橋），這也足證明他對於不夜城紐約的都市生活表示着不調和了。他以為「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靈性的表現，」（論自殺，）

如印度的泰戈爾老人似地，他否定二十世紀的文明，要回到自然。他感到「文明只是墮落」，他詛罵「文明人」（海灘上種花。）同美國的風尚不相合，到了康橋，徐志摩接受了吸烟的文化。康橋使詩人作了一個重新的開始。在吸烟與文化裏邊，他說：「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不得不到那樣甜蜜的機會了。我不敢說康橋給了我多少學問或是教會了我什麼。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在康橋那種貴族的世界中，他忙着散步，划船，騎自轉車，抽煙，閑談，喫五點鐘茶牛油烤餅，看閑書。在那個心欲的國土裏，他建立了他的理想主義的哲學，他的自然崇拜的理想。那種陶養，使他深感到「浪漫的懷鄉病」，憧憬到「草深人遠，一流冷澗」的境界。強烈的個人主義的 *everlasting yea* 和浪漫的懷鄉病，因之，成爲了這位「朝山客」，這位「不羈之馬」的思想的中心。他的藝術的人生觀——「人生是藝術」（話）——在康橋是被胚胎出來了。

貴族的市民出身的詩人徐志摩在康橋同當時的貴族化的英國市民社會融合一起。他深受了英國的世紀末的唯美主義印象主義文學的影響。同時，他更接受了英國的貴族層的浪漫詩人的薰陶。如果有人對於英國十九世紀末的文學同徐志摩的作品對照起來，作一個比較研究，我以為是很有趣味的。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資本主義到達了極絢爛極成熟的時代，寄生的社會層得到了過剩的生活餘裕，於是，應運產生出來對於世界的全然唯美的態度，人生之最高的意義在於美的主張。達到了帝國主義的成熟期的英國，擁着廣大的殖民地，在歐戰以後，其資產者社會仍持繼着過着寄生生活。而且，在歐戰期，英國沒有直接地蒙着戰禍，它的牛津仍是牛津，牠的康橋仍是康橋。從那種貴族化的市民社會，詩人徐志摩發現了他的理想的糕糧。他發現了他的理想的政治與理想的革命。（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而是在那裏他發現了他所心愛的諸作家。在他以為，他那些「生活的趣味」都是些「不預期的發現。」他告訴過我們裴德（W.Pater）歌德，柏拉圖，雪誅，杜思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丹農雪烏，盧梭，波多萊爾之所以被他發現，「都是邂逅，不是約會。」（濟慈的夜鶯歌，）他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給你以「靈性的迷醉」。由於同中國社會之矛盾，他感到：「實際生活的牽掣可以却去我們性靈所需要的閑暇，積成一種壓迫」。（自剖）然而，對於生活的壓迫，他不感絕望。他要「迎上前去」。在再剖裏，他說：「我寧願我自己跳進了這現實的世界，存心想來對準人生的面目認他一個仔細」他不斷地作他的「靈魂的冒險」「要在這忽忽變動的聲色的世界裏，讀出幾個永久不變的原則的憑證來」。（海灘上種花），可是，他的玄學的追求，是終沒有完成的答案，喲！在自剖，再剖之後，他思想上起了轉變。他背起了他的十字架，由盲衝轉變到有意識的行動，從對於社會之不調和不承認的態度，轉變到「迎上前去」。在迎上前去裏他肯定地說：「是的，我從今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個消息是活動，第二個消息是搏鬥，第三個消息是決定；思想也是的活動的下文就是搏鬥」，他的「赤子之心」他的「單純的信心」，使他積極地作他所謂的「理想中的革命。」

單純的信仰給了他勇敢。單純的理想給了他力量。他的靈性的勇敢使他崇拜拜輪，說出來「他是一個美麗的惡魔，一個光榮的叛兒」。（拜輪）。他崇拜耶穌，托

爾斯泰，哥德，密爾頓，悲特文，密其郎及羅，文天祥，黃梨洲等等的人物。他崇拜他們，是因為他們有不可動搖的 *simple faith* 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是單純的——宗教家為善的原則犧牲，科學為真的原則犧牲，藝術家為美的原則犧牲——這一切犧牲的結果便是我們現有的有限的文化」。(海灘上種花)。是因為黃梨洲，文天祥，在非常的時候，「為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為人，他的『理想中的革命』的要求，使他，在落葉裏讚美俄國革命，讚美俄國國旗說：「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却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使他，在同篇中，更讚美法蘭西的大革命，說：「巴士梯亞是代表阻礙自由的勢力。巴黎市民的攻擊是代表全人類爭自由的勢力巴士梯亞的，下是人類理想勝利的憑證」。在自剖裏，他又說：「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着 *Marty*，口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胆量實行，我們的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費的」。可是流血的事情，是他所不喜歡。的詩人徐志摩的革命的要求，只是在於爭「靈魂的自由」。而且，他的理想

政治是英國的政治，是希臘的政治，他所理想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在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之中，他說：「英國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頑固的。自由與保守並不是衝突的，這是造成他們政治生活的兩個原則；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歷史上並沒有大流血的痕跡，（如大陸諸國），而却有革命的實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頑固，所以雖則『不為天下先』，而却沒有化石性的殼」。然而英國對於殖民地的剝削與壓迫，希臘的奴隸社會，他一概不提。愛和平是他的天性。因之，對於羅曼羅蘭，他表示出來深摯的共鳴。羅蘭的空想的英雄主義，他認為是一種最高的理想。他以為羅蘭是勇敢的人道的戰士，是同托爾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泰戈爾，甘地同樣，立腳於高高的山嶺上，俯瞰着人間社會。「打破我執的偏見來認識精神的統一；打破國界的偏見認識人道的統一。這是羅蘭與他同理想者的教訓。解脫怨毒的束縛來實現思想的自由；反抗時代的壓迫來恢復靈性的尊嚴。這是羅蘭與他同理想者的教訓」。（羅曼羅蘭）。尼采所說的「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那句話，是他的座右銘，「在苦痛中領會人生的實際」，在痛苦中實現生命，實現藝術，實現宗教，實現

一切的奧義」之這種人道的英雄主義，也在此地成爲了他的理想了。遊了莫斯科，對於革命後之俄國社會表示不滿，接着，他就自命爲羅蘭的同理想者了。在弔劉叔和文中，他認爲「五卅」前後的中國國內情形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而難得的是少數共患難的旅伴。因之，在大的社會中，詩人徐志摩是感到孤獨的。詩人徐志摩所要求的，是反抗現代的墮落與物質主義的革命運動，是心靈解放的革命。他的這種要求，是從他那有士大夫性的個人主義出發的。到最後在秋裏，他悲嘆士民階級之沒落，而結論到「我們現在爲救這文化的性命，非得趕快就有健全的活力來補充我們受足了文明的毒的讀書階級不可」。在話裏，他說，「真偉大的消息都蘊伏在萬事萬物的本體裏，要聽真值得一聽的話，只有請教兩位最偉大的先生……就是生活本體，與大自然」。在秋裏，他仍再貫徹着這種思想。他依然是主張把過度文明的人種帶回到生命的本源上。他主張人多多接接近自然，一方來補充開鑿過多分的士民階級，一方極力把教育的機會推廣到健全的農民階級裏。打破階級界限及省分界限，獎勵階級間的通婚。不過這種理想，是不是可以實現的呢？這種對於士民和農民的關心，是表明着詩人徐志摩的

*simple faith*之所由來了。

雖然詩人徐志摩要求着「一種要新發現的國魂」，可是，那是從他的個人出發的。他，在列甯忌日——談革命裏，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這並不高深，這只是說我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我相信德謨克拉西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在各個人自覺的意識與自覺的努力中涵有真純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他崇拜列甯，說列甯有如耶穌的偉大，是崇拜個人，而不是主義，他認為「生命祇是個性的表現」而是感情把一些個體的組織起來的。他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在落葉裏，他說：「人在社會裏本來是不相連繫的個體，感情，先天的與後天的，是一種線索，一種經緯，把原來分散的各體組織成有文章的整體」徐志摩是一個感情性的人。他的一生，就是要實現「生活是藝術」的主張。他的感情，使他在苦痛中在時代悲哀中實現他自己。他的感情的生產，就是他的詩歌。他忠實去創造新的人生準則。他在話裏說「不能在我的生命裏實現人之所以爲人，我對不起自己」。在爲人爲的生活裏，不能實現我之所以爲我，我對不起生命，這個原則我們也應該時時放在心裏」。